

清末四川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及其影响

凌兴珍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社科学报编辑部, 成都 610068)

摘要:清廷实行改书院、兴学堂的新政后,督抚士绅将选派留日师范生作为弭祸、兴国、造民、立教的重要手段来提倡,《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派人员到东洋学习师范,四川留日师范教育因此得以发展起来,且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四川留日师范学生大多在日本接受的是为期半年或一年的速成教育,不仅新学知识参差不齐,而且与传统文化存在疏离和冲突,部分人回国前后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为四川引进民主革命思想与日本教育资源,大多数人回国后从事基层教育工作,部分优秀者还出任省县视学、地方军政官员等职,给四川教育转型、思想学术变迁、社会政治变革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转型;师范教育;留日速成师范;四川

中图分类号:G65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4-0121-09

清末留日速成师范对清末教育及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早在1926年,舒新城就注意到“日本速成师范与中国师范教育”之关系问题,并拟专章研究^{[1]93-127},可惜未能付诸实践。此后,学界对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研究持续不断,并公认清末师范教育深受日本的刺激与影响,甚至有“清末的师范教育是在日本教习手中成长起来的”,是“日本模式的师范教育”的说法^①。不过,既有研究多属宏观或整体的讨论,而微观研究仅限于张之洞、袁世凯任总督的两湖、三江及直隶等省份^②,曾被赞誉为“四川教育界一大胜利,一大荣誉”^[2]的清末四川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却少见论述^③。鉴此,笔者拟利用所见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考察清末四川留日师范的兴起背景、发展概况、教学内容、回国任用及其影响,旨在说明地方官绅在清末教育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留日师范教育给清末民初四川带来的影响。

一 官绅认识、提倡与留日速成师范的兴衰

早在1872年,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但因风气未开而收效甚微。甲午惨败后,中国朝野上下要求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者日多,凡论及新政者又莫不以游学与师法日本为要径。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指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3]9737-9738}。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诏令实行新政,继而谕令各省改书院、兴学堂,各地新政及新学人才严重缺乏。张之洞、刘坤一于是提出奖励游学日本等七项兴学育才建议,“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有赴外国游学一法……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且以赴日留学最为理想,以师范专业为最急需^{[4]3-41}。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3.1),张之洞等人订定的《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派人员到东洋考察学务和速成师范,“若无师范教员可请者,即速派人到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

收稿日期:2008-1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重点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凌兴珍(1965—),女,重庆渝北人,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审,“中国近现代史”省级重点学科兼职研究人员。

学速成师范若干人,学完全科师范若干人”,“各直省亟宜于官绅中推择品学兼优、性情纯挚而平日又能留心教育者,陆续资派出洋……考察外国各学堂规模制度及一切管理教授之法,详加询访体验,目睹外国教习如何教、生徒如何习、管理学堂官员如何办理,回国后分别派入学务处暨各学堂办事,方能有实效而无糜费”^{[5]3-4}。在张之洞等人的极力鼓动和政府的奖励督促下,清末负笈东洋速成师范与考察教育者络绎不绝。据学者统计,光绪二十九年三月至光绪三十年九月,毕业于日本各类师范学校者占留日毕业生总人数的44.1%,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大致保持这一比例^{[6]161}。究其根源,在于“将要在日本建立起来的新式学堂中缺乏合格的教师,从国外延请教师花费太大;此外,即使花费大量钱财,也难于得到好的外国教师;因此,较快的办法就是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特别是鼓励到日本去留学”^{[7]438}。

清廷改书院、设学堂诏令颁行后,四川各地陆续创办新式学堂或改书院为学堂,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以解决新学师资缺乏问题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四川总督奎俊接受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建议,仿湖北办法选派省城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中西学堂22名学子赴日留学^[8],其中进入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的有陈崇功,陈崇功系四川官派留日师范之始。

因受奎俊选派留日及湖北官派留日速成师范的影响,四川各属举贡生员等在省城创设游学公会,积极筹集经费就学东瀛,“期于速成师范,为学堂教习之用”^[9],并禀请四川提学吴郁生立案并筹给津贴。鉴于“学堂兴设之初,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较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蜀地偏僻,乏才更甚”,旧有办学者“半拘书院旧习,其于学校管理、师范、教育之法,多未谙究”的情况,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吴郁生咨请四川总督岑春煊:“夫开通见识在乎兴学,兴学必先求师范,会通中西在乎游学,游学必先取高材。惟是事久费钜,寒士既无其力,公家亦艰于用”,建议提拨州县津贴武举闲款为留学经费,选派举贡生员留学日本以速成师范,根本意图在于“冀以培才之法寓诸兴学,即于兴学之中默图弭祸。十年以后师范众多,不必糜费金钱借才异地,则广设学堂始有把握,振学士日新之志气,庶可化偏隅隐患于无形”^[9],吴郁生因此成为四川认识到留日速成师范具有兴学、育才、弭祸等重要意义的第一人。

四川总督岑春煊采纳了吴郁生的建议,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考选四川官自费留日学生,荣县黄芝、吴永锷皆榜上有名^{[10]16},次年春即派出官自费学生20名前往日本留学^{[11]399}。其中,进入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的官费生有成都华阳王章祐、李维祺、双流陈暄3人,自费生有成都华阳刘镜、温江张卜冲、新津刘毓槃、万云松、重庆江津戴夔钟、夔州云阳程理权、泸州合江刘汝兰、嘉定荣县黄芝、吴永锷、犍为周泽等10人^[12],合计13人(约占该年四川留日生总数57人^[13]的22.8%)。这是四川第一批官派速成师范生。

光绪二十九年春,四川留日官自费学生30余名联合向正在日本考察学务的方旭等人建议,“每县以官费派一、二人到日本学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并请各县酌量资助自费留学生”^{[10]22}。自日本考察学务归来的方旭,赓即在《上岑制军请四班并进以造师范禀稿(节略)》中指出:“偏僻州县风气未开,舍旧图新,几同鑿空”,“欲兴国,先造民;欲造民,先立教;欲立教,先谋师,此不易之法也”,建议岑春煊用“速成班、预备班、启蒙班、推广班”等“四班并进之法”大规模培养兴学师资,其中“速成班”即“令州县各择年长而中学通者一人,派赴日本,习速成师范,八月毕业,回国专为经理学校之员”,“预备班”即“于省城设东文学舍,令州县择年二十以上、中学稍深者,大县三人、中县二人、小县一人,送社习东文东语或兼习英语一年,再派赴日本习本科师范,三年毕业回国,以为高等小学校教习之员”^[14],可见方旭是将师范教育看作兴国、造民、立教的首要途径,把留日师范教育看作四川兴学之初培养兴学师资的最重要手段来认识的。

锡良继任四川总督后,采纳了方旭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通令各府厅州县,每县集资选士一至二人,次年正月在重庆取齐,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以明教授、管理之法^[15],以造就蒙师与管理学务人材;十一月,再次通令府厅州县,“各州县慎选年长而明于事理,人品端正,可充学务首事者一人,务于年内报名,限明年正月底在重庆取齐,另派委员领赴日本学速成科”,并特别强调“此项学生专为管理学校事务,不重在聪颖异众之天资,而重在为守兼优之人品”^[16],四川大规模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的政策正式形成。锡良一面利用省城原中西学堂附设算学馆空废房屋设立东文学堂,考选举贡生监60名肄习东文,以“备游学而广师范”^[17];一面奏派周凤翔为监督,同时咨请驻日公使杨枢转咨日本外相立案并通知宏文校长预为

部署,“四川保送之官自费生将就读速成师范科,专学管理学校之法,八个月毕业”^[18]。光绪三十年二月上旬,《四川官报》第2册《劝办学堂说》还对留日速成师范政策进行白话宣传,劝导和动员科举儒生或塾师赴日速成师范以投身新式教育。三月,正式考试官自费留日生,五月录选的154名合格者出发(实际正取158人,其中官费139人、自费19人,备取8人^[19]),六月到达日本宏文学院。这是四川第二批官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也是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批留日师范生。

锡良这次选派留日速成师范之举,引起省内外官绅士民的广泛关注,并对此后的留日速成师范及相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推动。

首先,重庆府废即选派了一批公自费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年四月初旬,重庆知府张铎接受官绅建议,就重庆府中学堂“择其年齿稍长(16—35岁)、中学尚优、志趣平正、不涉轻躁之士,挑派九人”,送赴日本宏文学院专习速成师范科,八个月毕业,并就学堂文案、教员中选派监督1名,“率同前往,仍一体入宏文学院专习师范”,“每年选派一次,即选派监督一员”,目的是“堂中教习、文案诸有教育之责者均可陆续前往,俾得咸迪旧学,时长新知,师友互为观摩,邪说无由熒惑”;锡良赞其“先得我心”,原来锡良初意各属岁筹专款多派生徒,“但虑瘠区绌力,故以一人开先而心固未慊”^[20]。重庆府中学堂选派的第一名监督是学堂文案、华阳优廩生孔庆余(字保之),首批公费生是李时存、何禹皋、许琼林、李成志、邓春秣、刘纯熙、李丕成、戴亮吉、李成章九名,另有“自费八九人”^[21-22]。

其次,各地官自费游日师范生络绎不绝,各地游日预备学堂纷纷筹设。光绪三十年九月,会理州康受嘉、马彝德、太泽宇三人“先后游学东洋,速成师范”^[23];至光绪三十年底止,四川先后在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师范的留学生计198名^[12];光绪三十一年初,华阳林思进、蒲伯英(殿俊)、杨沧白(庶堪)东游日本考察教育^[24],林思进则进入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一年多^[25]¹⁴⁷。随留日教育快速发展,省城东文学堂已难满足需要,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学务处总理冯煦咨请在通省师范学堂附近择地设立游学预备科,次年三月锡良奏请以省城贡院西偏房舍改设游学预备学堂,将东文学堂学生移入,并酌添新班^[26-27];在此前后,重庆东文速成学堂、广安东文师范学堂相继成立^[28-29]。

第三,锡良官派学生中有一名女子官费留日生,即成都府王诗(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到达日本、九月进入日本实践女校工艺科^[30]),四川女子留日由此兴起。四川留日生除呼吁女子留学或游历是“吾蜀女子亟不可缓之图”^[30]外,还建议“州官遣派数名学生来日留学,或学一年之速成师范,归而开办女学,以开风气于先;或学数年之专修高等,归而扩张女学,以谋进步于后”^[32]。据学者谢长法考证,除王诗外,日本实践女校本科的自费生邱兆东、日本女子美术学校编物科的官费生吴巽华、日本女子美术学校造花科的自费生魏向环、日本大成女学校师范科的自费生王余景蓉四人,皆是四川留日女学生^[31]。另据报道,清末四川荣昌余孝廉的夫人张氏曾“随夫赴东,考究女学”^[33];罗燕斌、陈宝琼留日回川后受聘为四川女学堂管教员。由此合计,清末四川官自费留日女学生应不少于8人。

第四,四川还官费选派了一批留日实业师范生。按癸卯学制规定,四川筹划于省城府试院开办农工学舍,为培养亟需的实业教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冯煦详请锡良酌量变通实业教员讲习所入学资序章规定,酌选学生24名到日本学习实业教育^[34]。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锡良飭令学务处挑选省城高等学堂、成都府师范学堂、华阳小学堂学生共21名,另由周凤翔就留东自费生中挑选8名,分学日本高等师范4名、铁道4名,其余以7名学农业、14名学工业,嗣后又在日本挑选铁道学生13名,一律给予官费;后因日本高等工业速成科不收别国学生,学工业的学生遂分派6名认习商业^[35]。三月十四日,高等学堂选派的冉猷璞、江树、张荫棠等11名学生辞别四川总督东赴日本^[36];三月二十一日,成都府师范学堂挑选的周国辅、周烈等人亦辞别四川总督东赴日本^[37]。

第五,管学大臣、山西留日生建议仿四川等省办法选派官自费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管学大臣奏称:“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着各省一律办理”^[38];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西留日师范生盛赞:“浙、蜀各省即用地方派生法,均派生数百东游速成,归即在本地方教育。盖广开民智,普及教育,此最为至美至易之举也”,建议山西仿浙蜀办法派遣留日速成师范生^[39]。

由于日本教育设施无法应付中国留日浪潮,大部分留日学生到后只能作权宜之计的课程安排,“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0]200-201},更有部分人加入同盟会,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光绪三十二年六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权衡利弊后出台了限制留日速成师范的系列文件,四川留日师范迅速走向衰落。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中国留学日本宏文学院 1050 人,四川仅 6 人^[41];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中国留学东京高等师范官费生人数分别为 31、27、21 人,四川仅 1、2、2 人^{[42]52}。

由此可见,清廷实行改书院、兴学堂的新政后,督抚士绅相继将选派留日速成师范生作为弭祸、兴国、造民、立教的重要手段来提倡,张之洞等人主持拟订的《学务纲要》更是极力倡导各省速派人员到东洋学习师范,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教育变革背景下,清末四川官派留日速成师范政策得以形成,并迅速付诸实践,且派遣规模较大、人数较多,截至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止四川留日宏文速成师范生已达 228 名^{[43]450-471}。可以说,清末留日速成师范政策的形成,是与教育界的认识、官绅的提倡以及教育变革与社会近代化的需求密切相关,它归根结底是一项由国家民族危机引发的救亡图存的新政举措。

二 课程设置与留日速成师范的教育

根据规定,日本宏文学院“肄业之年限,凡普通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乐科等,其年限均系随时酌定”,学制有一年半、八个月甚至六个月的^{[44]60}。四川选送的留日速成师范生,虽拥有官职、教职及举人、贡生等头衔,中学基础较好,但却较少涉猎物理、化学、博物等普通科学,他们需到日本补习的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的理化、博物、外语及教育学科知识。光绪三十年六月,日本宏文学院专门成立“四川速成师范科”^{[44]47},经周翔与嘉纳治五郎商订,编班为甲乙丙三班,“一文科,一理化,一博物”,课程“最要者若十八门”^{[45]1},学制一年四学期;除通学师范应学各科外,每班“各重一门,甲班理化,乙班博物,丙班法制经济,以为归国分任教科”^[46]。兹将其功课列如表 1。

表 1. 游学日本速成师范生功课表

课程	算术	代数	几何	三角	物理	化学	心理	教育	法制经济	学校管理法	教授法	教科书编纂法	地理	历史	图画	日文	体操	总计
甲班	第一学期	6					2	4					4	4		6	4	30
	第二学期	2	4	4			2	4	2	2				2	2	3	4	31
	第三学期		3	3	2	4	2	2	2		4				2	3	3	30
	第四学期		2	2	2	8	8	2				1				3	3	31
	总计	96	108	108	48	144	120	48	144	48	24	48	12	48	72	48	180	168
课程	算术	代数	心理	教育	地理	历史	理化	教授法	法制经济	学校管理法	博物	教科书编纂法	日文	体操				总计
乙班	第一学期	2		2	4	4	4				4		6	4				30
	第二学期	4	4	2	4				2		6		3	4				31
	第三学期	2	2		2			2	4		2	8	3	3				30
	第四学期				2	4		4			2	12	1	3	3			31
	总计	96	72	48	144	96	48	72	48	24	48	360	12	180	168			1464
课程	学校制度	伦理	教育	心理	管理法	教授法	万国地理	理化	万国历史	教科书编纂法	算术	教育及地方行政大意	经济大意	法学通论	教育史	日文	体操	总计
丙班	第一学期		2	4	2			2	2		2			4	2	6	4	30
	第二学期	2	2	4	2			2	2		4	2		2	2	3	4	31
	第三学期			4		2	4	2	3			6	3			3	3	30
	第四学期	4		6			2	4	2	1		3	1			3	3	29
	总计	72	48	216	48	24	48	96	48	84	12	72	132	48	72	48	180	168

说明：原表所列丙班第四学期每周学时总数 30 和一年四期学时总数 1640 均有误，本表已按实际合计数分别改正。参见《游学日本速成师范生功课表》，《四川学报》1906 年第 7 册，表第 2 页。

从表 1 可以看出，四川留日速成师范各班，学制一年四学期，学科 17 门，总授课时数甲乙两班各 1464 小时、丙班 1440 小时。

四川留日师范生在日本宏文学院的受教育情况，笔者所见的编译讲义可供管中窥豹。(1)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学报》曾刊载王章祜、刘震等人辑录整理的日本宏文学院师范讲义四种。它们分别是第 1 册刊载王章祜辑录《学校编制法》讲义，第 2—3 册连载日本谷延治原讲授、王章祜阐述、文澄笔记的《伦理学》讲义，第 2—3 册连载日本棚桥源太郎口授、王章祜辑录《理科讲话》，第 13—16 册连载日本安田清忠编辑、刘震译述、龚道耕删润的《小学校管理法》。其中，《学校编制法》“以中国现行章程参合日本学制”编成，共分两节，第一节为小学校之本旨，认为小学校本旨有四：一为身体养育，二为道德教育，三为国民教育，四为知识及技能教育；第二节为小学校之种类，分别解释官立、公立、私立学校之旨意。谷延治原的《伦理学》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学，“伦理学者，行为之学也，从前中国之讲伦理学则谓人对他所必由之理即为伦理”，“伦理学为精神上之科学”。棚桥源太郎口授的“理科”，指的是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学科。(2)光绪三十二年日本东京木活板所榎本邦信印刷发行、四川留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生编译的授课讲义《师范讲义》17 编 13 册，最能完整反映川籍学生在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的受教育情况。可惜，这套书已难觅得，四川大学图书馆仅收藏《师范讲义》第一部《教育学》《教育史》两编。《教育学》系日本本庄太乙郎的讲义，共 184 页，分上、中、下三篇，主要对教育的综合性问题、方式问题、方法问题作了阐述；该讲义将知识分为“自然知识”和“心的知识”，自然知识包括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地质诸学科，心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论理、史学、言语、法学、经济、行政诸学科；本庄太乙郎认为，学习教育学，须先有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进化论四科作为预备，“教育者，所以扶持人类之道义，增进国家之文明。故必先以四科为主要，而后施教者有其本领，受教者易于感化”。《教育史》系日本增户鹤吉的讲义，共 64 页，分为“概论”、“古代东洋教育史之概要”、“西洋教育史”三部分，对中西方教育历史、特点及其得失作了概述。增户鹤吉认为：“教育史者，专记教育之已事也。其范围似隘，然而人心思想，与社会政治之发达，皆以教育为原动力。故一代之文明进化，必以一国之教育为起点。一国之教育进化，必以一家一人之教育为起点。则至重至大者，莫教育若。中国数千年来，皆依赖官吏以治国，但以养成官吏为目的，其教育居少数；泰西则依赖国民以立国，故以养成国民为目的，其教育重普及。通塞殊，而强弱亦因以异。则欲矫中国之弊，要在博观精择，舍短取长。”“凡身任教育，必深悉东西教育史，而后能舍短取长以改良自国，如日本维新以前取法中国教育，维新以后兼采欧美教育，吸精取华，以致今日之盛。中国既有本来教育，倘一换以西法，进步必更速于日本。”^[47]正如论者所言：“这些来自一百年前的声音，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在今天看来亦不无启发意义。”^[48](3)宣统元年四川留日速成师范归国生还编写了《地理总论》、《外国地理》、《行政法大意》、《算术》、《法学通论》、《西洋史》、《教育学》、《教育史》、《伦理学》等科讲义^[49]¹⁰⁵。上述编译讲义大致能反映四川留日速成师范生受到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熏陶。

除了规定课程外，川籍留日师范生还主动吸取与家乡发展关系密切的新知识新技术，以便日后为家乡建设服务。据资州籍留日速成师范官费生张荫堂报告：“仁寿之辜大渤、李邦凡，资阳之杨学渊，井研之周坦，内江之熊会昌等均能积极向学。至实业科如制糖、造纸颇多兼习，将来学成归里，于资属向产糖、纸，必能力图进步云。”^[50]他们还积极学习体育技术、参加体育比赛。光绪三十年冬，涪州邹鸿定在宏文学院全院 700 余人的运动会上三获优等，嘉纳治五郎亲奖宝星一枚，“足为乡里增色”^[51]；成都华阳萧执中对游戏体操独有心得，曾在四川省城各学堂运动会上倡行游戏操，为中外人士赞赏，冯煦特许其将来担任“中央师范学堂体操教习兼游戏体操”^[52]。

不过，留日师范生出国前既缺乏必要的语言与普通科学训练，留学时间多为一年甚至不足一年，故多数人只能囫囵吞枣地接受并不精深的新学知识，即便是卒业师范生的学业程度亦十分有限，甚至有部分自费师范生，“中学并无根柢，游学并未入校，或虽入校而受课不全，或暂上堂而研究未至”，未获“毕业凭照”或仅获修业凭照而“挖补修业字迹”^[53-54]。

三 回国任用与留日速成师范教育的影响

关于留日速成师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外学者论述较多。一种观点认为,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人受康梁立宪派和孙中山革命派影响而成为共和主义的鼓吹者,大多数归国学生受读书做官思想影响而不愿从事教育职业^[55];另一种观点认为,留日速成师范教育,对中国的改革、新文化的发展是有功劳的^{[44]61-64},尤其对中国基层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56]53-54,[57]103,[58]313-314}。就四川情况而言,由于“贛派师范东游,原为各属办学管理无人”,“且日本宏文学院附设之速成师范班,既非高等师范学校可比,学期只有一年”,援照游学外洋寻常师范毕业之例,“令该举人等于各本籍高等小学堂或充校长或充教员,并将师范传习所酌为整理”,“或分别派入师范学堂及传习所以资襄助,此正办也”^[59]。尽管东游速成师范生毕业时并未获得资照,且因照搬外国办法而致僻陋地方“指学堂为教堂者,有目体操为洋拳者,因而打毁学堂之案层见叠出”^[60],锡良要求各属慎选慎用。终因办学人员缺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先到师范传习所、师范学堂襄办,然后到各府厅州县初高等小学堂担任监督或教员,部分优秀者后来还出任省县视学、地方军政官员等职。

首先,参与和襄助师范教育。由于小学需师孔亟,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间,各属应急赶办的师范讲习所,普遍存在“开办迟早不一,毕业先后不等,而教授管理诸法在优者亦不过特绎刊本,浅尝者尚不知门径,责以教育之任,本属勉强”^[61]等问题。光绪三十一年夏,四川学务研究所第七次会议决议,从速开办成属三月速成师范,“即以归来诸君担任教育,以三班所得之学识,集而授之一人之身”^[46]。九月,锡良令就省垣设所,成属各州县派员生赴所学习,东游各生亦附从听讲;十月初,讲习所开学,成都府16州县来学者292人、其他州县和贵州来学者24人,合计316人^[62]。同时,锡良通令外属各府直隶州,调集东游回籍及新班诸生,择取相当之地,利用年期终届之际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仿成属师范讲习所办法,赓续接办师范传习所。据资料记载,自光绪三十一年秋至次年春,四川华阳、平武、东乡、南川、什邡、云阳、宜宾、达县、内江、筠连县及叙州府、泸州、雅州、酉阳州、邛州等处,纷纷利用东游师范生回国之际,或新设、或续办、或展长传习师范期限,大规模集训学堂师资。不仅如此,留日速成师范回国生还积极参与师范学堂的规划、筹建与管理、教学工作。比如酉阳知府唐恭石曾“函约回国游学日本之谭、陈诸生,商议于州城设一师范学堂”^[63],谭焯首任监督;川东师范学堂的筹建者、首任监督杨霖及继任者冉献徵、童宪章、刘德萃、杨霖、龚秉权,皆为留日速成师范生^①,该学堂因此获得建筑合式、规制完整,管理规则整肃、教学成绩甚优之好评。

其次,担任普通学堂教职员、省县视学乃至地方官吏。岑春煊派出的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年春陆续回川,很快被聘请为初等学堂教习,如省城八旗学堂聘王章祐为教习、新津蒙养学堂聘万云松为教习、成都公立第六小学堂聘龚煦春为教习。锡良选派的留日速成师范生,光绪三十一年秋相继回国,除年终之际担任师范传习所教员及襄办师范学堂外,大部分于次年春被任用为高等、初等小学堂监督或教员,如杨秉堃被聘为定远县高等小学堂教员、陶懋鑫主持云阳县高等小学堂校事等。部分留日速成师范生后来还出任省县视学、地方官吏。据资料记载,宣统元年,四川设省视学六名,其中川东区张凤翮、川西区何元体、下川南区程昌祺、川中区周泽、川北区杜明燁,皆是留日速成师范生;清末任省城劝学所总董的彭兰芬,清末民初任县视学的张凤翮、邓鹤丹、程理权、彭赞尧、邓开璧、闵鸿洲、白世杰、刘镜、陈金镛、杜芬、刘德麟、李春藜、陈宗彦、康受嘉、曾吉芝、黄泽渊、罗祖泽、陈文彬、周坦、胡存琮、万云松、安永祥、杨秉堃、郭选芳、邱本岑、胡祖虞等26人,清末民初任地方官的王章祐、张澜、李又新、景昌运、陈宗彦、陶明道、胡存琮、杜明燁、陈金镛等,皆是留日速成师范生。他们或参与地方基层教育的策划与管理,甚至在政权更替之际出任地方长官、省县议员、县团练等职,对地方教育、政治及社会变迁产生直接影响。

不仅如此,留日速成师范归国生还给四川社会带来了另外一些不容忽视的影响。第一,部分人在留日期间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并在回国前后加入同盟会,成为四川民主革命的骨干力量。自光绪三十一年冬,同盟会川籍会员如陈崇功、童宪章、杨霖、林冰骨(即林启一)等人相继回川,“以同志陈道循、涂德芬、陈德元毕业将归,林冰骨藉应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之聘亦将到成都,特嘱道循在川南,德芬、德元在川东,冰骨在川西,先行秘密征集会员”^{[64]40-44},并自光绪三十二年起的四川成都、重庆、叙州府等地策划反清革命起义,为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辛亥革命成功及清政府灭亡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人积极为四川引进日本教习、教学仪

器、教材等教育资源,使日本先进的教育学术资源直接进入内陆四川,对四川教育学术与社会变迁产生直接影响。据报道,泸州小市女师传习所、泸州官立女子师范学堂担任音乐、图画、体操、理科等科教习的日本冰其梅女士(又译“滨崎梅”)[65],川东师范学堂担任算术、几何、物理等科教员的阿部好一(日本寻常师范学校并物理学校毕业)[66]326等,皆是留日师范归国生聘请来川的;参与重庆幼稚园附设保姆师范科创办与教育的日本山口智慧女士(日本薄记精修学校并技艺学校卒业)[67],参与重庆东亚女学校创办与管理的太田喜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68],则是川籍留日师范生陈新知、黄润荪娶回的夫人。另据报道,留日师范速成科张卜冲、王章祐曾运解省城高等学堂在日本购买的图书、仪器回川,学务处曾电告日本留学监督周凤翔代为正在筹办的通省师范学堂“购置图书、标本、仪器”[11]524,王章祐、刘震等人曾将在日本学习的四种教材编译刊发在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学报》上,日本宏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生还将各科讲义编译印刷成《师范讲义》17编13册运送回川廉价发售。第三,留日速成师范归国生不仅学识修养参差不齐,而且言行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疏离和冲突,给教育转型与社会变迁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郭沫若就读的嘉定府乐山县立高等小学堂,留日速成师范生帅平均,“他的算术真是可怜,除了照着抄本教了我们一些就像图画一样的罗马数字以外,他演起习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他学的是甚么柔软体操,教了我们许多日本式的舞蹈的步法。他的音乐最是自鸣得意的,他按会了风琴,教了我们好几首《吾党何日醒》的爱国歌”[69]63-77。留日速成师范生在传习师范时,“以有限期日,不传切近九科教法,而侈语高深,不实练教管方法,而偏重原理,如生理、心理、博物、外语等科……至于奏定章程规则,多有师范生至今不见闻者,正以从不传习故”[70]。有学者注意到,留日归国生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文化,“使他们与乡村中国愈加格格不入……他们的外国倾向有使他们脱离自己背景的危险,即一种游离于祖国社会的失落感,简言之,即精神上的颓废和情感上的疏远”[71]414-415。

由此可见,留日师范教育为四川培养了第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理论与新知识训练的新型师资,他们或积极投身四川教育事业,担任师资培训、教学管理、省县视学,成为基层教育骨干力量;或进入地方职官行列,成为地方行政管理的生力军;或积极为四川引进日本教习、教材、教学仪器以及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对清末四川教育、学术及政治变迁产生直接影响。

注释:

- ①参见黄土嘉《清末师范教育的萌芽(1897—1911)》[《近代中国》(台北)第115期(1986年10月3日)]、(日)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昭和63年(1990)版]、李杰泉《日本对晚清师范教育的影响》(蒋永敬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美)任达《新改革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93年版)等论著。
- ②涉及清末留日教育的论著,主要有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六章(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增补版)》(三联书店1983年版)、(日)阿部洋《日中教育文化の交流と摩擦——战前日本の在华教育事业》[东京第一书局昭和58年(1983)版]、(美)葆拉·哈勒尔《播种变革的种子:中国学生与日本教师,1895—190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
- ③关于清末四川留日师范教育的情况,目前王笛《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概述》(《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清末四川留日学生概述》(《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两文有简单概述。
- ④《川东师范学校民国24年度概况报告书·川东师范学校历任校长》,重庆市档案馆:民国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档案,案卷号0129-1-310。

参考文献:

- [1]舒新城.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小史[C]//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上海:中华书局,1936.
- [2]周传儒.王叔钧先生对于四川教育意见[J].四川教育新潮,1922,(12).
- [3]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12册[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4]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变法三折[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8辑47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5]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G]//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第一册.湖北学务处铅印本,时间不详.

- [6]陈学恂,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7]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8]前督部堂奎奏派学生赴日本肄业片[J].四川学报,1905,(2).
- [9]前提督学院吴奏闲款选派游学折[J].四川学报,1905,(2).
- [10]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G]//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 [11]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锡良遗稿:奏稿第一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J].四川学报,1905,(8-11).
- [13]派遣游学汇志[J].东方杂志,1904,1(2).
- [14]省城劝学所.四川学务文件汇编:第二册州县学校谋始[G].成都:探源印刷公社,1908.
- [15]总督部堂通飭道府州厅所属之偏僻者各选一人听候调取肄习札[J].总督部堂锡奏陈学务情形并推广办法折[J].四川学报,1905,(3,13).
- [16]总督部堂通飭府厅州考验所属选送赴东学学校管理各生[J].四川学报,1905,(5).
- [17]前提督学院吴奏设东文学堂折[J].四川学报,1905,(2).
- [18]总督部堂咨驻日杨公使保送速成师范生文[J].四川学报,1905,(2).
- [19]督宪照会监督赴日本学生周主政凤翔文[J].四川官报,1904,(10).
- [20]重庆府张振之太守详请提款资助游学公文附总督部堂批[J].广益丛报,1904,2(28-29).
- [21]联翩东游[J].广益丛报,1905,3(6).
- [22]选派游学[J].四川官报,1905,(13).
- [23]会理兴学[J].四川官报,1904,(23).
- [24]前言[G]//刘君惠,王文才,等.清寂堂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
- [25]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M].成都:巴蜀书社,1987.
- [26]学务处总理详请设立游学预备科并师范补习科一案[J].四川学报,1905,(14).
- [27]补习招生[J].广益丛报,1906,4(29).
- [28]游学预备[J].四川官报,1906,(3).
- [29]广安学务汇志[J].广益丛报,1906,4(13).
- [30]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J].近代史研究,1995,(2):276-277.
- [31]敬告蜀中女界[J].广益丛报,1909,7(15).
- [32]留日四川简州学生胡锡璋等致书学务局书[J].广益丛报,1907,5(2).
- [33]巾帼壮游[J].广益丛报,1907,5(13).
- [34]学务处总理冯详总督部堂请派学生出洋学习实业一案[J].四川学报,1905,(11).
- [35]总督部堂奏派学生出洋学习实业片[J].四川学报,1905,(14).
- [36]辕门抄录[J].四川官报,1905,(8).
- [37]辕门抄录[J].四川官报,1905,(9).
- [38]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J].四川官报,1904,(2).
- [39]山西留学日本师范生致李观察宗棠函附书后[J].四川官报,1905,(8).
- [4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41]留学日本各省学生人数表[J].四川学报,1907,3(1).
- [42]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1.
- [43]凌兴珍.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4](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修订版)[M].谭当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
- [45]周翔.序言[M]//四川师范生.师范讲义:第一部.东京:木活板所榎本邦信印行,1906.
- [46]光绪三十一年研究所第七次会议[J].四川学报,1906,2(1).
- [47]四川师范生.师范讲义:第一部[M].东京:木活板所榎本邦信印行,1906.
- [48]石瑜.一百年前的《四川师范讲义》[J].文史杂志,2005,(3):78-79.
- [49]张立程.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06-05.
- [50]瀛简东来[J].四川官报,1905,(20).

- [51]涪人特色[J]. 四川官报,1905,(3).
- [52]游戏体操[J]. 广益丛报,1906,4(5).
- [53]总督部堂通飭各属切实整顿应办应禁各事札[J]. 四川学报,1906,2(4).
- [54]整饬学务[J]. 四川官报,1906,(14).
- [55]Cameron, Meribeth E.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chapter 4.
- [56]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33.
- [57]王焕琛. 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一册[G]. 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
- [58]黄福庆. 清末留日学生[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59]宜宾县详速成师范生自立师范学堂一案并批[J]. 四川学报,1906,2(1).
- [60]学部札飭各省提学司查察办学官绅文[J]. 四川学报,1907,3(5).
- [61]总督部堂飭成属各州县选派员绅赴省城讲习所札[J]. 四川学报,1905,(16).
- [62]成属师范传习所学生姓名籍贯年岁表[J]. 四川学报,1905,(20).
- [63]唐恭石初到酉阳晓谕示文[J]. 广益丛报,1906,4(15).
- [64]林冰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四川分会之发轫[G]//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政协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四川保路风云录.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65]泸州女学[J]. 女学述闻[J]. 广益丛报,1906,4(17,29).
- [66]川东共立师范学校一览[M]. 重庆:中西铅石印局,1933.
- [67]重庆创办幼稚园[J]. 广益丛报,1906,4(5).
- [68]女学之发达[J]. 广益丛报,1908,6(5).
- [69]郭沫若. 少年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70]查学委员知县颜绍泽请飭各学堂限制年龄及传习师范生务照定章讲授禀[J]. 四川学报,1906,2(3).
- [71](美)费正清,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Speeded-up Normal Education of Sichuan Students in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LING Xing-zhen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Editorial Office of the Journal of SNU,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its educational reform, local officials, scholars and gentry advocate student-selection for normal education in Japan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misfortune-removing, state-prospering, citizen-cultivating and education-establishing, and *Xue Wu Gang Yao* especially encourages various provinces to take such measures quickly, in which circumstances normal education of Sichuan students in Japan develops rapidly on a large scale with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which in turn has influences upon Sichuan's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ideological and academic change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Key words: Late Qing Xinzheng Revolution;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normal education; speeded-up normal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Sichuan

[责任编辑:李大明]